

[灯下漫笔]

南丰后人

近日,偶读“稻田派”作家周华诚(常山籍)的散文《六间房记》,甫一开头就“黏”住了我——“一曰望田。推窗可望田……寒露过后稻熟,有人驾驭收割机前来,轰隆隆声势浩大……此机器下得田中,大口吞吐,半小时即告完工——稻草归了稻草,谷粒归了谷粒;一支长长的机器‘手臂’伸出,袖筒中哗啦啦吐出稻谷来……”看得真切时,我便把抚弄“稼穡”的往事“闪”成了如下的文字。

在我刚参与稻田农作的时候,还真没见过什么收割机。老家的三间泥瓦房就在一座山间的水库脚下,屋后是个小山坡,门前是库水流下的一湾小溪,小溪的上边即是一大片农田。

我的割稻劳作是从读初中阶段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统一放暑假,老师要求学生们去“勤工俭学”,返校后还要上交一篇作文。

时值农村里“双抢”大忙。早稻要抢收,晚稻要抢种。稻谷的收割脱落还属于纯手工活,更没有现在的割脱一体机。我们几个同学紧跟着大人去收割早稻,等放到一大片后,就做传送稻把的运输工作。因为脱落稻谷是重体力活,脚踩的打稻机似乎也还没有诞生。正劳力要把沉甸甸的稻把举过头顶,有节奏地在木桶中摔打,直到稻穗打干净为止。遇到稻田水未放干时,不到一个时辰,我们满身都是泥浆,就像沼泽中摸爬滚打的猴子。每当腰酸背痛想偷懒歇歇,大人们常常说一句:“小年轻哪里有腰哇?力气用了很快会回来的。”我们又蹦蹦跳跳地穿梭在泥田里。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为了赶季节,把山排田的水稻(长势一般般)放开给社员承包收割,收割一亩可记工分十分。我抽签到了刚好一亩稻田。凌晨时分,大家趁着月色就出发了。我拿起镰刀,赤脚踩到田里就埋头收割起来。不管蚊叮虫咬,不顾大汗淋漓,也不理会老鼠小蛇在田里串动,全神贯注地匍匐在金黄色的稻根下。抓紧一株,割之,抓紧一株,割之,一步一步地往前挺进。直到收割了三分之一的面积,方才坐在田塍边的乌桕树下,牛饮般地喝起家里带来的凉茶。那一天,我真正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就我一个人,一天割稻一亩。老父亲也含笑点头,晚餐上还奖励我半碗酒呢。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生产队,与父老乡亲一道修理着家乡的那块地球。那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个姐姐已经先后出嫁,我就跟着年近古稀的父亲学着种田。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里雨里不停息,没过两年,我的犁耙耖技术自觉得有模有样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我家里分得了几亩责任田,父亲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不能长时间下水作业,用牛耕田的技术活就靠我来承担。经过多次观察以及偶尔鞭牛扶犁,我就大胆地开始实践了。可那集体的耕牛很是不听我话,一不小心,我把犁头深插到了一块石头下,左右开弓都拔不出来。我拿着竹梢当牛鞭,一阵猛抽,抽的牛也火冒三丈,硬是挣扎出去,把邻家田里的秧苗踩得稀巴烂。我自然招来一顿臭骂,一



个劲地赔不是,我分给邻居户主一支香烟后,自己一股脑地瘫在田边抽闷烟。

后来,我考进了县机关工作。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单位里号召“下乡支农”。我们一行十多人,来到联系乡镇何家的一农户田里帮助插秧,他家缺劳力,可是季节不等人。这个时候,我有过几年农村劳动的经历,就派上了用场。从拔秧,到捆扎秧苗,再到分秧扦插,大家都想问问身边不可多得的我。

岁月如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自新千年以来,年逾八旬的父母相继离世,我已经多年没有干过稻作活了……

不经意间,我打开窗户,一曲《垄上行》歌曲悠悠传来“我从乡间走过/总有不少收获/田里稻穗飘香/农夫忙收割/微笑在脸上闪烁……”

我知道,本土作家周华诚先生经过六七年的奋斗,把“父亲的水稻田”做成了名闻遐迩的农耕文化品牌。真想,嘛时候到他那“一亩三分地”去体念一番。



县城地下党员(三)

口述:邹鼎山
记录:马朝虎

电话局经常接待国民党的要员,从他们口中得知,国共两党终于要联合抗日了。

散落在南方各省边远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已经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不日将经华埠北上参战抗日。

国民党要求电话局严密观察防范,限制中共对地方百姓的影响。

这个消息让我很兴奋。但一听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来,当地的地主富商们都忙着藏匿财物细软,局势反而更加紧张。

果然没几天,由陈毅率领的第一红军支队先期到达,2000多人在华埠集中整训了半个多月。

国民党的兵我见多了,共产党的部队是第一次见,发现他们彼此间互称同志,没有上下级之分,看起来很是亲密。我亲眼目睹一名司务长因为虚报菜价,贪污了集体十七元伙食费,竟被投票公开处决。

陈毅走后,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司令员的第三支队也途经华埠北上。我与张云逸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938年3月的一个午后,新四军二支队后续部队某团首长在江山打电话给已经前进到华埠的三支队司令部,要请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接电话。

二支队的通讯装备十分简陋,没有专线和电话局总机挂通,要由公差传呼,来电话局接电话。

等了十多分钟,来了一位士兵装束的中年男子。他中等身高,穿着旧灰布军装,紧束皮带,小腿绑带打得整齐扎实,走起路来快速稳健。

我在心里猜他最多也就是个副官或军需之类的干部,所以当他把传呼回单递给他时,就用略带怀疑的口气说:“江山团首主要向张参谋长亲自汇报请示呢。”

想不到这位大兵哈哈一笑,还称赞我工作认真负责。及至接通电话,听到他自报是张云逸,对方立即说:“报告张参谋长……”

我这才确信,这个看似普通一兵模样的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云逸,怪自己狗眼看人低,不由地吐了吐舌头。

但是,通话刚开始,又突然中断了。原来衢州防空哨站传来日机空袭警报,接着又是紧急警报。

张云逸参谋长一点也没有慌乱。

空袭警报响起来后,很多百姓争先恐后地向公路对面的山上跑去。电话局附近就是华阳小学,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孩子挤在大人堆里,随时都有被挤倒踩踏的可能。

张云逸沉着冷静地站立在门口指挥群众疏散,告诫大家不要惊慌,不可争先恐后,要强帮弱,壮帮老少,有序疏散。

这次空袭,日机向衢州机场疯狂投弹几十枚。一刻钟后,警报解除,与江山的通话恢复。

打完电话,张云逸与我握手道别:“谢谢你,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邹鼎山。”

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追星一样,我也有了崇拜的偶像,喜欢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一心想加入他们。

经人介绍,1938年秋天,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要求我以电话局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我就接到第一个任务,为新四军前线筹款筹衣。我的上级组织联络人林一心书记,握着我的手说:“这事由你全面负责。”

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呀,光荣而又艰巨,我必须去完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作为任务负责人,我当然先把工资捐了,又发动几个党员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买棉买布,很快四十多件棉背心就赶工完成了。

未完待续……

